

民生视点

花钱之前，请先想想纳税人

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变异，还是举债追求“政绩工程”，或者“多设置几个副市长、副秘书长”，说到底，都是“怎么花纳税人的钱”的问题。

成 露

是“出国考察”的内容？

去年年底，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旅游费用相对比较高。想不到的是，一些地方官员早已借助“出国考察”的渠道，玩遍全美了。正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这份“出国考察费用清单”详细表明，温州“考察团”23人21天花费65万元，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夏威夷、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等10个美国大城市的著名景点，“公务活动”却只有5天。新余“考察团”11人13天

花费35万元，纵横北美10余名城，同样包括赌城拉斯维加斯。行程看，是“出国考察”还是公款旅游，依靠常识就能判断。多余的狡辩，只能是辱没纳税人的智商。

2007年3月，民革中央委员麦康森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透露，“至少有1/4的公费出国成名副其实的旅游，而不是考察”。透视“出国考察”蜕变的背后，固然源于监督制度虚设，恐怕更跟纳税人意识缺乏有很大关系。“出国考察”灰幕拉开后，有一些地方官员还

替同僚们“喊冤”，认为他们“运气不好，太倒霉”，这更能说明一点：在不少地方官员眼里，出国考察变相为“福利旅游”相当正常，事实上也比较普遍。问题是“出国考察”动用的是公款。公款是谁的钱？这些地方官员有没有严肃认真地问过自个儿这个问题？

“出国考察”变相为“福利旅游”背后还有一只利益推手。在一些地方，有的部门就以“组织官员出国考察活动”为部门创建小金库，获取部门利益。一些旅行社还大搞公

关，把组织“出国考察”作为重点业务。从不少地方相继曝光的新闻来看，一个小小县市，一年组织一二十批次“出国考察”很常见，从市、县、镇到村，轮流组织一遍。

出国考察应是“工作需要”，出国旅游则是“私人休闲需要”。让私人旅游打着“工作考察”的幌子，这就是滥用公权。公务员、官员都有带薪休假的权利，但集体借“考察、培训”名义，行“出国旅游”之实，不管是组织者，还是被组织者，动辄花费几十万元公款，不知道有没有想过纳税人的感受？公款来自于纳税人，花钱之后，心里要想想纳税人，这样的花钱之法、如此挥霍，是不是对得起纳税人？“出国考察”变相成“福利旅游”，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些地方的官员根本就是没有纳税人意识。

挥霍纳税人的钱，何止“出国考察”？因为缺乏纳税人意识，缺乏公共财政来源于纳税人的强烈意识，在一些地方，“三公费用”——公务招待、公车、公务考察的支出也是急剧上升，举债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歪风屡禁不绝，今天修好的路明天就“开膛破肚”，办公大楼建设没用几年，找个理由拆了重建……就在“出国考察费用清单”曝光的同时，某300万人口的地级市“一个市

长，九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20个副秘书长”，某贫困县“30多万人，居然有15个县长助理”的新闻也一起被披露。这些现象，背后就是因为根深蒂固地盘结着一种“花公家的钱不心疼”的思想。

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变异，还是举债追求“政绩工程”，或者“多养几个副市长、副秘书长”，说到底，都是“怎么花纳税人的钱”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离不开地方官员纳税人意识的根植和强化。根植这种意识，就必须从“公款”和“公家的钱”，向“纳税人的钱”转变，这种转变看上去没什么分别，其实蕴涵着“人治意识”向“法治意识”的深刻转变。

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官员的观念里，只知道自己的花的钱是财政的钱，上级拨下来的钱，不去想这是纳税人的钱。没有“那是纳税人的钱”的意识，就管理不好纳税人的钱，用不好纳税人的钱，也就没有真正为纳税人服务、对纳税人负责的意识。

根植这种意识，就需要公共财政更加透明起来。有了纳税人的监督，有了纳税人对自己的钱的关心，官员花纳税人的钱，就会慎之又慎，就会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

资讯速览

上海铁警与地方联动执法

本报讯 为打造良好的迎世博陆上交通环境，确保冬季铁路运输安全，上海铁路警方会同地方21家部门，于12月1日联合成立铁路上海站地区联动执法大队，整合多方力量，对站区首次实行无缝隙管理。

长期以来，铁路与地方的治安管理各管一段，导致结合部位的治安管理出现薄弱环节。一些长年混迹站区的不法人员趁机与警方玩起“游击”战，铁路警察来了就跑到地方一侧的地带，地方警察管得紧了就回到铁路地盘上，致使黄牛倒票、拉客及“黑车”非法经营等现象屡禁不止。

联动执法大队的职责是在各执法单位主体不变的情况下，派员合署办公，形成一支标识统一、职能全面、快速反应的常态管理力量，齐心协力专项打击、整治各类治安“顽症”。（林荣贵）

日照港不让一个农民工失业

本报讯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波，使山东日照港（集团）的各项运输业务一度陷入青黄不接的“寒冬”，同时也让长期扎根港口生产一线的近万名农民工，对眼前能否保住“饭碗”心存顾虑。

该集团和直属单位的两级工会组织通过与行政领导沟通协商，给农民工吃下一颗定心丸：“即使生产建设面临的现实困难再多，也决不让一个在港农民工失业！”日照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杜传志，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爱东，反复强调，农民工和正式职工一样，都是港口企业发展的主人翁和生产建设的主力军。目前，全港27个直属单位充分利用用工余时，对合同聘用的农民工进行“充电”和岗位技能拓展训练，以迎接港口新一轮生产建设高潮的到来。（滕以来 孟仔敏）

新疆首条伊霍铁路铺轨进展顺利

本报讯 备受新疆各族人民关注的新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精（河）伊（犁）霍（尔果斯）铁路，11月21日铺轨到达北天山苏吉尔车站。至此，精伊霍铁路已累计完成正线铺轨104.94公里、站线铺轨9.416公里，架桥28孔、铺道岔24组。这标志着承担全线铺架施工任务的中国中铁一局新运工程公司已提前完成了2008年铺架任务，为2009年铺轨顺利到达霍尔果斯奠定了坚实基础。

（杜芳林 徐智第 王立红）

晋城金融机构情倾“三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山西晋城钟家庄信用社认真贯彻落实该省联社“三千三百惠农工程”实施方案，改进服务手段、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举措，延伸服务内涵，真心真意为辖区居民解决资金困难，帮他们走上勤劳致富之路，同时实现了自身业务经营的发展壮大。

据了解，钟家庄信用社坚持立足辖区、服务“三农”的宗旨，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突破口，通过“总额控制、一次核定、周转使用、随用随贷”的小额信用贷款方式，使辖区农户通过创业，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钟家庄信用社还将发展的目光投放到农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优良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扶持“公司+基地+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实现了双赢。（王红霞）

“关爱妇女儿童好新闻”将评

本报讯 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近日宣布，2009年将举办“关爱妇女儿童好新闻”评选活动。全国心系系列活动开始于1994年，由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协调，联合卫生部、计生委、民政部等单位成立了“心系新生”活动组委会，并陆续成立了“心系新人”、“心系好儿童”、“心系女性”等活动组委会。活动开展14年来，围绕妇女儿童关心的话题，推出了一系列科普教育的新理念、新观点，直接受益达9270万户。组委会在今年举办了“心系奥运”、“心系灾区”系列活动以及科普宣传教育工作，2009年将继续增加教育主题，扩大科普教育范畴，并不断向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深入。（卢剑锋）

她有一颗美丽心灵

在母亲身患尿毒症面临生死抉择之时，20岁的女儿挺身而出，为母捐肾。女孩救活了母亲，并带着母亲外出打工继续筹集后续治疗的费用……

本报通讯员 杨锦竺 蒲德贵



母女笑对生活 杨锦竺摄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李丽却在悄悄打算为母亲捐肾。她向医生打听捐肾的相关事宜，并电话咨询了一位接受肾移植的尿毒症患者。他们都曾说，肾移植风险很大，作为年轻女孩捐肾，两年内不能谈恋爱，甚至有可能会影响生育，叫她慎重考虑。

李丽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毛衣放到母亲的床头，转身去厨房做早餐。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母亲刘维平心里既心酸又温暖。她为今生能有这么好的女儿而骄傲。

刘维平心里明白，自从2007年12月8日，女儿在重庆捐肾救她以来，女儿突然间变得十分成熟，张罗着家里的大事，还带着她到上海打工挣药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重担。

母患重病欲放弃治疗

在女儿李丽的心中，母亲刘维平是伟大的，经历了万般磨难。李丽3岁时，父母离异，她跟随着母亲，寄托在重庆能源集团綦江石煤勘探外公家。为贴补生活，给李丽缴学费，刘维平独自外出打工。

10多年打拼，眼看李丽长大成人。2006年，李丽中专毕业后，随母到上海工作。然而好景不长，2007年2月，刘维平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为肾衰竭。

为节省治疗费，刘维平转回重庆治疗，经进一步检查确定为尿毒症。在透析治疗中，刘维平因感冒加重了病情。去年10月2日，刘维平乘车到綦江县透析，路途病情恶化，心跳加速，恶心，最后人事不醒。后经抢救得以苏醒。

李丽得知情况，迅即请假赶回母亲身边。陪护期间，医生告诉李丽，要想救母亲，惟一的办法是肾移植。

难题摆在一大家人面前，肾源从何而来，昂贵的医疗费如何解决等，都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李丽的外公、外婆、舅舅等亲人都主动要求捐肾，但由于年龄、肾源质量不合格等因素，不能供肾。生命到了最绝望的时候，刘维平含泪告诉家人，“算了，这就是命运，看来我活不了多久了。”

“当时，所有的亲戚都绝望了，我还想到如何给刘维平料理后事。”刘维平的父亲刘永珍说，他还托人给女儿找过墓地。

之后，李丽回上海继续治疗，干脆辞职。为筹集10多万元的手术费，她们卖掉了矿区的房子，还借了不少钱。

去年11月27日，李丽带上母亲到重庆市沙区公证处公证捐肾事宜。28日，她们收到了配型成功的喜讯。

去年12月17日，捐肾手术前头一天，刘维平的心情异常紧张，住院期间，她多次听到有人说，手术风险大，甚至失去生命。而最让她担心的是，一旦手术失败，自个活不成倒没什么，将给女儿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我不晓得女儿是否承受得起呀。”刘维平说。

在充满紧张气氛的病房中，女儿看到了母亲的焦虑。走到母亲跟前，“妈妈，不要担心，即使成功了，要是你妈妈活不了多久，你今后缺少一个肾，会给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刘维平也拉着李丽的手，哭泣道：“我的好女儿，妈就你一个娃儿，你不要捐，我怕影响你今后的生活。”

“妈，你不要说了，我的生命是你给的，我现在为你献出一次也是应该的，何况医生说了，捐一个肾对我没啥影响。”李丽抱着母亲大声说，“妈，我要为你的生命赌一把，我相信会成功的。”

医生玩笑式地说，怎么了，有些紧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才不后悔呢，只要能救妈妈，我心里特别开心。要是我还有第三个肾，还想捐献给其他患者。”李丽微笑着说着。

手术当天，对李丽的外公刘永珍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先后看着自己的外孙、女儿推进手术室。焦急的等待，犹如炼狱般的煎熬，他难以预测她们的生死。看到亲人推进推术室，他和老伴一直没停过眼泪。

直到下午4时，刘维平的手术车推出，得知肾移植成功，两位老人方才落下了心中的石头。

女儿的肾在母亲的体内存活。晚上11时，刘维平苏醒了，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女儿的状况。医生告诉她，“你女儿身体一切正常，她还惦记着你呢。”闻听此话，刘维平眼角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三天后，母女相见。李丽走到母亲病床前，母女的手牵在了一起。“妈妈，你好些了吗，有啥不良反应吗？”

“我没事，你身体还好吧？”母女俩相互询问着。

携母打工挣药费

肾移植成功，对医院、家人来说都是好事。而喜悦的背后，困难也接踵而来。为缓解肾脏排斥，刘维平还需长期服药，需要大量药物。

根据测算，每月需药费四五千。如何筹集费用，难倒了刘家人。李丽的外公刘永珍说，“她们母女都是靠打工为生，现在生病了，没有收入，而我的退休金每月只有1000块钱左右，维持一家人生活都困难。”

此时，李丽心中明白，家里拿不出医药费，母亲的病情也许还会复发。她要想办法为母亲筹措药费。

住院期间，她看到病友用输液管制作的“胶管金鱼”非常好看，说不定还能卖钱。她萌发了制作手工艺品上街卖钱的想法。她把想法告知了母亲。“妈妈，我们现在很缺钱买药，我想到街上卖手工艺品，我学制作胶管金鱼，你缝制手工好，你绣鞋垫。”

刘维平听后，感动的泪流满面。“丽丽，这不行，外边的风雪大，万一感冒了怎么办，我不想让你出事呀。”

女儿执意要去，宽慰母亲，“妈妈，你放心，我会多穿些衣服，不会感冒的。”

今年1月25日，李丽穿了很厚的一身衣服，挎包里装了10条“胶管金鱼”，4双鞋垫出门了。她选择了重庆三峡广场旁的一个角落。

北京举办全球创业型经济论坛

我们离“创业社会”有多远？

本报实习生 付洁 本报记者 成露

劳动力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他说，通过创业，使城乡居民拥有产业（商业和工厂）、物业（房地产）、财业（股票、债券和存款等）、事业（工作室、个体经营、特殊职业、个人发展项目等）、就业（工作岗位）和家庭（住房、耐用消费品和汽车等），才能扩大中国全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减少因失业造成贫困人口、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形成一个较为公平初次分配的格局。

根据2002—2006年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05年的全民创业活动指数为13.7%（即每100位年龄在18—64岁的成年人中，有13.7人参与创业活动），在2005年的全球创业观察成员中排名第5位，处于前列；2003年，中国的全民创业活动指数为11.6%，在2003年的全球创业观察成员中排名第9位。

“这说明我国在全球的创业活动中创业者比例逐年增加，有逐渐活跃的趋势。”中国人生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在论坛上高兴地说。

但他也冷静地指出，尽管中国经济二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创业经济的发展和创业精神的释放，但从总体上看，创业型经济的成长还较为缓慢。主要表现在：创业环境的整体状况不太理想，生存型创业仍然占据主导，大多数人的创业行为具有被动性，尤其是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还有待提高。如，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没有自己的商标。可以说，目前支撑

中国经济增长的创业活动还处于较低水平。

在谈到创业型经济发展缓慢时，吴江认为是“创业环境不善”。突出问题表现为创业的金融支持弱、非金融中介服务少、创业教育培训及研究开发的转移条件缺乏、机会平等性和市场准入的公正性较差等等。他说，中国的创业资源配置依然以政府为主导，创业投入严重不足，创业投资只占到GDP的0.02%。同时，孵化器或创业园区尚处于提供初级生产要素和硬件设施的发展阶段。

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全球创业型经济论坛执行主席陈广庆抱有同感。他说，近些年，很多地方在营造创业环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创业环境总体不甚理想，尚属于创业机会多、创业动机强、创业活动较为活跃，但创业能力不足、创业环境还不够宽松。

他建议，今后，政府制定创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应是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业环境，保护创业成果，增加创业收益，努力消除一切影响创业的体制性障碍，尽最大努力帮助创业人才克服“最大静摩擦力”。

建立创业教育体系

在谈到完善创业环境时，出席论坛的不

少专家都谈到了创业教育问题。他们认为，从目前的整体状况看，我国教育培训对创业支持力度的力度非常有限。

“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多已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并把这一策略视为创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创业教育还没有深入到这个层次，才刚刚开始在高校进行创业教育试点。”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全球创业型经济论坛执行主席陈广庆迫切地表示，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教育集中在学位教育和之后的在职教育路上。但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国内已经认识到我国创业教育落后，创业人才短缺、创业培训匮乏的现状，积极大胆地进行多方尝试。

他认为，我国的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应分阶段进行。先在高等教育中加强创业教育，再逐步普及到中小学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着力构建包括法制体系、管理体系、教学体系、科研体系、评价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层次创业教育体系。通过创业教育，不断激发劳动者的创业激情，增强创业意识，焕发创业精神，提高创业能力，转变就业观念。

从世界各国企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的规律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博士说，95%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65%~80%